



一、从打制到磨制，那关键的一步

基督教关于上帝造人的故事很有趣。据《圣经·旧约全书》的开篇“创世记”所述：上帝耶和华在六天里创造了天、地、海和世界万物。在第六天，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地上的尘土造出了一个人，往他的鼻孔里吹了一口生气，人就活了。上帝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亚当。然后又从他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成一个女人，给亚当做妻子，她就是夏娃。上帝最初造出的这对男女，就是人类的始祖。

有的基督徒对于上帝造人，根据新旧约，考证出上帝造的人距今有 6000 多年的历史了。

而在周口店出土的山顶洞人为代表的晚期智人至少也有 13000 年了（苏联测出的数据）。

当今的人类学界主要关注的是智人也就是我们现代人直接祖先的来源和迁徙，关注旧石器究竟通过何种途径进入了新石器。

北京猿人的脑容量平均已有 1088 毫升（约为类人猿的 2.5 倍），进化到山顶洞人后，脑容量在 1300~1500 毫升，与现代人基本一样了。

但是，是如何向新石器时代迈出那关键的一步的呢？

二、房山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形态

山顶洞人时代，智人已经开始了频繁的迁徙，如果将“石器之路”凸现出来，就等于将散落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智人时期的文明，用一条线索串联了起来。在此之后，伴随着打砸石器的敲击声，人类逐渐进入了磨制石器的时代——新石器时代。

在北京，乃至华北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位于门头沟地区的东胡林遗址，距今有一万余年的历史。和东胡林遗址相距不远、时代也差不多的遗址就是“镇江营塔照遗址”（以下简称镇江营遗址）。东胡林遗址在新石器时代之后，上面没有堆积了，而镇江营遗址的堆积一直持续到魏晋时代，可以说是埋藏在地下的一部通史。

140 米。目前，这块孕育了古老文明的台地在大面积缩小。

台地中间的一条东西向长约 110 米、南北宽约 20 米的清朝采石沟几乎横断台地。据房山县志记载，清西陵的一块汉白玉碑即采自镇江营台地，为运此碑，曾在台地北部拓开了一条南北向的大道，发掘中证明这条大道开在采石沟北壁，宽 10 余米，深及生土，打破了中更新世的红色风化壳，破坏了台地北部的文化层。道路废弃后被回填，填土含大量碎石块和灰土。

采石沟内的基岩为东北、西南走向，盛产汉白玉。

台地北部的基岩高出地表 1 米余，基岩的表层含有大量的硅镁云母，所以镇江营遗址所有的夹砂陶器中的“砂”均为云母颗粒或粉末，手感光滑，器表发亮。显然，当时人们制陶是就地取材制作的。

台地南部的基岩陡然深入地下，基岩上部普遍覆盖了一层中更新世的红黏土风化壳，其上是一层河漫相的含小砾砂层，再上则为含粉砂的黄土层，文化层在黄土层之上。在 1989 年春季的发掘中，曾清理了 1 座汉晋时期的陶窑，窑中烟道垫砖为一面有勾纹灰砖。窑内木炭经树轮校正为公元 148—371 年，该窑被河流沉积的粉砂层所覆盖。在台地西南角，这一层粉砂最厚达 2 米，呈慢坡状叠压在文化层上。这一发现足以证明北拒马河在汉晋以前是流经台地西南的，河流改道台地东侧当在汉晋以后。1987 年秋季发掘中，发现镇江营台地最东部的一个探方内有与塔照台地最下层相同的文化遗物，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镇江营台地在北拒马河改道前与塔照的山前台地相连。由于常年的雨水冲刷、洪水切割，使之最终分离成两块台地。北拒马河的改道和滚动使两块台地间的距离仍有加大的趋势。

塔照遗址目前已经消失了，只能根据考古报告和当时的记忆进行有限的描述。

塔照村位于北拒马河东岸，东北距房山县城 34 公里，北面依山，地势北高南低。山上建有一座辽金时期的砖塔，山下村庄因此得名。

村南地势平坦。据村民介绍，二战期间日军挖过壕沟。1986 年，经钻探得知，该壕沟从河边一直通到村东的公路上，呈西南、东北的走向。1984 年，塔照村农民挖开了壕沟的西端开采大理石。

从采石沟的断面上可看出，基岩走向与镇江营台地相同，呈东北西南向。基岩上有一层中更新世的红黏土风化壳，其上为含少量粉砂的黄土，文化层就在这黄土层上。

1986 年 5 月调查时，采石沟长 130 米，宽 15 米。1988 年发掘时，采石沟扩展到长 155 米，宽 22~32 米不等。待 1989 年塔照遗址发掘结束，仅一个冬季，采石沟宽度又拓展了一倍。1994 年，采石沟荡涤了北侧的砖窑、石渣厂，东端穿过南北向的村路，南侧与公路几乎接通。采石沟的不断扩展完全破坏了文化层。

四、发掘

1986 年开始发掘镇江营遗址，当时遗址所处的台地平面近似椭圆形，面积 2 万多平方米，东北角伫立着明万历年间修建的和尚塔，北面是北京通往河北易县的公路，北拒马河流经台地东缘。

这都构成了此处和易县的连接。

遗址北部面积较大，基岩高出地表，被柿树林覆盖。1986年发掘的1个探方，刚好开在清代运石道路的西边缘上。经过钻探，发现北部只有东西两侧有小面积的文化堆积，东侧较薄，平均厚1米左右，西侧略厚，平均3米，中间已被清代采石工程破坏殆尽，故而放弃了在遗址北部大面积发掘的计划。1986年首次发掘就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灰坑。1987年为了解遗址东侧文化层发掘1个探方，1989年发现西周刻字卜骨。

遗址的南部面积较北部小，东半部是柿树林，南缘约30米宽的地带被厚厚的河流冲积沙土所覆盖，南断崖可见生土之上为河流冲积沙土。经过全面钻探，整个南部文化堆积相当厚，一般可达3米，西南部新石器时代堆积略厚一些；加之西半部无树林，大面积的发掘在西半部。

很可惜的是，镇江营遗址没有统一划分地层，当时各个探方的遗迹现象纷杂，土质土色情况各异，表明不同时期在此居住的人们有着频繁的生产活动。一块同样土质土色的堆积覆盖的面积很小，通常不过两个探方，因此很难在一个发掘区内找一层相同的土。为了客观地反映遗址复杂的文化堆积，发掘中，每个探方独立划分地层。

于是，使得镇江营遗址地层、遗迹显得现象复杂，一种文化堆积有时不能覆盖整个遗址，经常分布在一二个探方的局部，而某一大时期的文化堆积又能覆盖所有的探方。考古人员只好在介绍地层情况时，将地表耕土以下的文化堆积分成若干组，再以组为名分别叙述。

第1层，地表耕土层，黄褐色，松散，厚15~45厘米。北壁剖面可看到叠压在第1层下，打破两探方的第2层，红褐土，质松软。出土的陶器均为形体较大的夹砂红陶、灰陶的小口瓮、敞口盆及铁锛等，年代约相当于汉晋时期。

第2层、第3层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多为夹云母灰陶，以竖绳纹为主，常见器物有折沿袋足鬲、多孔甗、深腹盆、鼓腹罐、四系罐、高圈足簋、仿铜小鬲及磨制精致的骨、角器。按照地层排列顺序，这组地层定名为商周第四期遗存，时代相当于西周中晚期。

第4组地层中出土了大量的胎质厚重的夹云母褐陶器物，以交错绳纹为主，常见筒腹鬲、鼓腹鬲、瓢、单孔甗、三角划纹簋、罐及鹿角斝等。遗迹中多直壁圆形灰坑。按照地层叠压顺序，这组地层定名为商周第三期遗存，时代相当于商后期至西周中期，其中相当复杂的遗迹与地层间的叠压打破关系表明，该遗存也存在着进一步划分阶段的可能性。

第7组，被叠压在第4组地层之下，厚35厘米左右，灰黑色软土。出土夹砂灰陶和褐陶器物，有斜绳纹高领鬲、束腰觚、篮纹罐、平底盆、双腹盆等。按照地层排列顺序，这组地层定名为新石器第四期遗存，时代相当于龙山时代晚期至夏初初叶。

这是重要的文化呈现。

随后发现了新石器第三期遗存，相当于雪山一期文化的时代。

真正有特色的是10组，处于所有探方的最底层，年代较早。厚35~75厘米，棕红色土，含细砂和红烧

土颗粒，质坚硬。出土大量陶器、石片石器及细石器。遗址出土的新石器第一期陶炊器陶器为夹云母红陶，器表陶色不匀，多素面，器形以大口、圜底为主，有釜、钵、盆、支座、



器盖等。按照地层叠压顺序,这组地层定名为新石器第一期遗存。由于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又称之为“镇江营一期文化”。这组地层内存在着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就是说这期文化具备了进一步区分阶段的可能性。

临近的定名为商周第五期遗存,则反映出春秋战国的特色。

南壁剖面平面近椭圆形,深45厘米。坑内填满含烧土粒红褐色硬土。出土陶器中有夹砂褐陶高领鼓腹鬲,唇面有短绳纹形成的花边,器表有斜行细绳纹,袋足跟部抹光无纹,其特征与雪山三期近似。出土陶器中大多数为夹砂褐陶,并有一定数量的磨光黑皮陶,器形有高领鼓腹鬲、折肩鬲、大口瓮、大口尊等。

该组地层是塔照遗址的主要文化堆积之一,叠压在商周第二期遗存之下,在拒马河流域总的文化顺序中,为商周第一期遗存,年代相当于商前期。

新石器第一期至四期、商周第一期至五期、汉晋时期遗存的考古学编年序列有着科学的、准确的地层关系作为基础。

这个考古学编年序列的年代关系,在镇江营遗址各个不同的发掘区诸剖面上均可得到进一步证明。镇江营遗址有着古代社会人类的长期居住的历史,前期人迁徙之后,后期人建立自己的住居和窑穴时,总要对地面进行翻动、平整,因此后一期的地层堆积都是在极大地破坏了前一期的地层堆积的基础上形成的。镇江营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

几乎所有的剖面显示出来的,都是某几期文化堆积的叠压关系,所有文化堆积并未同时出现在同一剖面上,这不仅是因为晚期堆积对早期堆积的破坏,还与某期文化生活于某一局部有关。覆盖面最大的、所有剖面均可见到的是商周第三、四期遗存,其次是新石器第一期遗存。

塔照4层黑灰土,质地松软,含黄土颗粒,厚30~110厘米。出土遗物有筒腹鬲、小口罐等。属镇江营遗址第5组地层,即商周第二期遗存。继续下挖,出土的陶器多为黑皮褐陶,有鼓腹鬲、折肩鬲、大口瓮等。文化面貌不同于第4层,属镇江营遗址第6组地层,即商周第一期遗存。

五、文化属性的讨论

在分析清楚了考古文化之后,参照史籍,商周第一期遗存能够得以用记载的历史事件解释。可以说,先商文化、古燕文化,燕地土著文化,在考古学上除了镇江营文化之外,还有一种说法是“保北文化”。

已逝的考古学会会长张忠培先生详细阅读了《镇江营与塔照——拒马河流域先秦考古文化的类型与谱系》后认为,这部考古报告,“不仅仔细地讨论了诸期遗存的年代关系,还对文化的成分进行了谱系的分析,指出新石器时代第一、二期遗存与商周时代第一期至第三期遗存,是同一谱系年代上相互衔接,或年代基本衔接的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北京发现的这类遗存,是形成于张家口及晋东北地区的同类遗存的主人向东南迁徙而留下来的遗存。这里的第三期遗存大致分布于桑干河—永定河流域及其东北地区。其东北与红山—小河沿文化分布区相邻。”

“我们可以从以往蔚县、易县及涑水的发现中,看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经历二里冈下层进

步到二里冈上层时期的情景，以及通过其中商文化因素而见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及其于二里冈下、上层文化时期的发展阶段，先后和先商文化及二里冈下、上层商文化的联系，并引进它们的文化因素而推动自身演变的情形，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在二里冈上层时期以后的命运，除于涑水炭山见到过这里确认的商周时代第三期文化的一些踪迹外，则一无所知。在这本著作中，除让人们更丰富地见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系统在二里冈下、上层文化的影响下而获得的进步外，又让人们明确地看到它先后引进魏营子那类文化、殷墟文化和周文化因素而推动自身发展的情景。这本著作所确认的商周时代第二、三期文化，基本上是镇江营与塔照遗址考古的新发现。这是相当重要的。正是由于这个重要的新发现，才使人们认识到二里冈上层时期以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命运。”

所以，《史记·燕召公世家》言“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当释为先有北燕而后有召公被封之燕。

北燕是史学长期探索而不解的问题，也是考古学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求证的热门话题。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这篇著名的文章中，苏秉琦先生基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地区和战国时代燕国地域之重合，敏锐地观察到两者文化的联系后指出：“绝妙的是这种鬲（指他所称的“燕式鬲”——引者注）的结构（袋式器体）恰恰同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鬲一脉相承。一个属青铜时代早期，一个属早期铁器时代，这种相似，能是偶合？”他把两者文化传承关系如此提出了出来，虽未论述，倾向性确跃然纸上。在当时资料积累的情况下，真是绝妙的见解。

因此可知，镇江营遗址系统地展示了北京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系列与谱系。可以看出北京地区是一个不同的谱系的文化的交汇地区，在此不同谱系的诸文化进行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内涵的繁杂与场面的壮观，引人注目。

六、燕地的土著文化

苏炳奇和张忠培先生说的北燕，就是指的土著燕部落，这个以燕为图腾的部落，在房山第一个被确认的遗址是西周燕都遗址，第二个被确认的就是镇江营。

房山的农业发生的时代早至 9000 年至 7000 年前。这从镇江营和塔照遗址出土的陶器和骨质农具可以得到印证。

农业和气候的关系很大，播种采摘，必须按照一定的季节或者温差来进行。当时是没有二十四节气表之类的准确历法的。那么，新石器时代的人怎样来确定季节的变化呢？据推测，可能是靠自身的体验，寒暖自知，人之常情。但是，那时的人是没有这种自信的，他们对天气气温的变化还处于莫名其妙的状态，惊讶于四季的递嬗。但是，在长期的观察中，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规律的现象，那就是大雁南飞，为寒霜将至；小燕北归，衔春暖到来。于是，燕子成为他们眼中一种神圣的鸟，它关乎着寒暑和收成。所以，在新石器初期各聚落结盟，确定族徽标志的时候，尚无民族夷夏之分，生活在包括房山在内的一些以血缘关系为主的聚落，选择了燕子作为自己的标记，燕子成为这几个聚落的原始图腾。其中包括后来称为“商”或“殷”的民族。

“燕”代表一大群聚落，作为一种图腾，被后来的人称为“玄鸟”，也就是黑色的鸟。由于从

北方南下的商部族打败了曾经有很大势力的夏部族，玄鸟几乎成为他们的专属。除了殷商之外，实际上，以燕子为图腾的部落还有很多，包括后来统一中国的秦部族，其开始时期也是以燕子为自己的图腾标志的。这中间反反复复经历了近千年的变化，后人只把商朝肯定为是燕图腾，写进了《诗经》等典籍，20世纪初期开始研究，有的学者认识到，玄鸟（燕子）并不是商族的专属图腾。50年代到60年代发掘殷墟，发现有些陪嫁的铜器上面，有明显的燕图腾的族徽标志，才用地下出土文物证明燕图腾是一个比较广泛应用的图腾。

早至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于省吾、傅振伦、金景方、侯仁之诸大家就都推测，在这里肯定有一个土生土长的文化，而且也基本肯定，这个文化也是以“玄鸟”也就是燕子为图腾。再追溯，国学大师王国维也有此见解。不过，他推测的范围比较宽泛，包括房、涿、涿、易四县等整个京西地区，即易水、拒马河一带当都属于土著燕国的范围。最新研究成果认为，和燕图腾部落有姻亲关系、商贸关系乃至征战关系的“狄”部落，也是鸟图腾——他们是以“雉”为图腾的。

当时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燕图腾”的男人定期到“雉图腾”部落里和那里的女子幽会交欢。雉图腾的男人去另外一个部落和那里的女子交欢。可是，在燕图腾的族群中产生了一个青年，我们叫他“爰”。他和雉图腾的一位称为“简”的姑娘心心相印，简不再接受别的男人，俊也不和别的女人来往。简怀的孩子，肯定是爰的后代。而且，这个简迈出了伟大的一步，她没有在自己的部落里生孩子，而是随着爰到燕部落中生下了这个孩子，并起名为“契”，全称是“契燕”。这是燕图腾中第一个以男性所在部落命名的人，标志着父系氏族社会的开始。燕部族也对“简”给予了充分的尊重，称她为“简狄”，使她成为部落的代表。

所说的商周一期文化，这是最为明显的成果。这一成果后为历代传颂。

《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毛传注解：“玄鸟，𪊑也，一名燕，音乙。”

这曲折地反映了这段历史。

这就是各族流行的创世传说和人祖传说，反映了这个民族对自己祖先来源的记忆。一般说来，这种传说都产生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尽管看起来有点神奇，却具有相当的历史真实性。

七、燕子成为图腾的自然和历史原因

一般说来，把燕子作为图腾的民族开始有了原始农业。春分之日的测定，即主要是依据燕子（玄鸟）飞至之日来确定的。据宛敏渭、刘秀珍《中国动植物物候图集》发表的中国科学院地理所1963年至1984年的观测结果，家燕于每年3月10日至31日始见于江淮一线，4月10日至5月10日始见于北京（包括房山区的拒马河一带）、石家庄一线，4月30日至5月10日始见于长春、哈尔滨一线，每年9月30日至10月10日绝见。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972）指出：“《左传》提到郟（tán）国国君到鲁国时对鲁昭公说，他的祖先少皞（hào）在夏殷时代，以鸟类的名称给官员定名，称玄鸟为‘分’点之主，以示尊重家燕。这种说法表明，在三四千年前，家燕正规地在春分时节来到郟国，郟国以此作为农业开始的先兆。”官职最高的人称为“玄鸟土主”。

拒马河畔的燕部族，与此有相同之处。燕部族当时可能有了一些类似窝棚之类的建筑，能够提供给燕子筑巢主持，从而也使部族首领首先意识到春天的到来，掌握了春播的主动权。因此，爰获得简狄之爱，两人能够回到燕部落生子，和对适龄的把握有着直接的关系。

至于传说中说简狄是因为吞食燕卵，生下了契，这个神话故事一直在民间传说着。这个“契”是知道自己父亲是“爰”的，后来，契也让女子（应该还是有娥氏的）到自家来，并且还要除了自己之外，不许她和别的男人交媾，自此之后能够从父系确定子女的归属了。

这是一场巨大的变革，或如恩格斯所说，是女性的一次历史性的失败。

几乎从这时开始，按照季节，男女交媾野合，开始逐步转向以男方为主。

《礼记·月令》仲春之月说：“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郑玄注说：“高辛氏之出，玄鸟遗卵，娥简吞之而生契，后王以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



镇江塔

就是说，当燕子到达时，正是仲春季节，人们将燕子视为“高禘”，也就是天媒。这时，要用最高的祭祀之礼祭祀“高禘”，由天子亲自主祭，后宫的皇后嫔妃跟随祭祀，为的是求子。后面写的是祭祀仪式，郑玄认为正因为简狄是吞食燕卵而生下了商族始祖，所以燕子就被视为“高禘”之神。实际是男女野合交媾的形势。

《礼记·月令》全同。高诱注说：“王者后妃于玄鸟至日，祈继嗣于高禘。”毛公《诗经·商颂·玄鸟》传说：“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娥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禘而生契。”

神话大家闻一多在《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中吸收郑玄的说法，认为夏、商、周三代都有高禘的祭祀，高禘就是生育之神，各国各代所祭祀的就是自己的女祖先。夏人高禘为先妣女祸，殷人高禘为先妣娥简狄，周人为姜嫄，楚人为高唐神女。生育子孙在上古居民是最为重要的一桩大事，因此以祈求生育为目的的高禘也就成为一年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大祭祀。

于是可以十分明确地说，古代以燕子为图腾的部落，以“爰”为始祖的殷商部落的开始，就是从镇江营和塔照开始的。这里距离后封的琉璃河的燕都遗址不远，顺河而上，徒步也就是三个小时的路程。

八、燕部落的拓展和文化的传播

从圣聚出发到易水也是超不过四五个小时的路程。拒马河和易水中间地带是两个部落

(民族)交往农耕或者放牧的地区。但是,从古文献记载来看,除了古燕部落和有易部落之外,在这个区域里还有一个称为“河伯”的部落。

在甲骨文中,商族契之后的第七代族长(部落长)名叫王亥,他娶的也是有易氏之女,这时的部落之间的婚嫁已经具有了和亲的性质了。如今最可信也最古老的文献为《山海经》,《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卜)牛,有易杀王亥,取仆(卜)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

不知什么原因,王亥离开了镇江营塔照,来到了有易部落和河伯部落,也就是寄住在易水河畔了。这里我们看到,王亥带领一部分人从镇江营塔照开始南迁,南迁的这部分成为后来的商族,留下的就是土著燕族。

王亥到了有易部落后,进行占卜用的牛骨的制作,王亥的这些占卜用的牛骨被有易部落看中,有易部落为了取得这些牛骨竟然将王亥杀害了。

在那个时代,最为重要的财富就是能够和天帝相通、预测吉凶丰欠、可行与不可行的占卜用的兽骨。制作这种兽骨是技术活。有了兽骨,掌握了占卜技术,就是掌握了话语权。

此前有人解释这段话的时候认为是有易部落是贪图王亥的群牛,将“仆牛”解释为牛群,这个解释不准确。商族大事在于“祀与戎”,其他部落也差不多,就是将占卜求神的事情看得至关重要,制作占卜所用的骨板也是最为重要的工作,制作出来的能和天地相通的牛卜骨就是最大的财富。甲骨文中“王亥服牛”的记载,后人考证说是王亥驯服了牛,有些历史科普读物上也是这么写的,“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这种读物。这从原理上来说不错,驯服了牛,才能杀掉它们,取得适合占卜用的卜骨。看来在王亥时期还没有使用从遥远的南海获得的龟甲占卜,于是,“卜牛”(占卜能够使用的牛骨)“卜鹿”(占卜用的鹿骨)成为最神圣之物。有易部落是为了贪图王亥的“卜牛”而杀害了他。后世还有记载,有易部落的人来杀害王亥的时候,怀孕的王亥的妻子有易女跳窗逃跑,王亥被杀后,她嫁给了王亥的弟弟。她生出的孩子名为上甲微,后来继承王亥成为商族的首领。他为了给父亲报仇,在今十渡和易水一带,由河伯主持,进行了一场讨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法律仲裁,认为错在有易,河伯代表众人,授予了上甲微一个“中”,上甲微拿着这个“中”去讨伐有易首领,得到了众人的支持,占领了有易部落,处决了有易首领绵臣。(见《清华简》公布的释读)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依据法律裁决进行的战争。

进攻有易部落,大胜,杀掉了有易部落的首领绵臣(杀害王亥的主谋)。但是,河伯和有易部也有很好的关系,“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

就是河伯念旧情,帮助有易部落逃走了很大一部分人。逃走的这部分人在一个生满野兽的地方居住了下来,开始以打猎为食,被称为“摇民”。有人考证,摇民就是后来的“鲜虞”,这个小国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更名为中山国,一度强大,后来被赵国灭掉。其留下的文物精彩极了!许多人每每提到都神采飞扬。

据此来看,有娥或有易是契的母族,在当时一定是一个以雉为图腾的显赫的大部落。到上甲微以后,有易这个名字就不再被提起,而它消失的原因,当然就是上甲微联合河伯对它的讨伐,并进而消灭了它。《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这件事的经过,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

这个解释和《山海经》的记载略有不同——说王亥被杀的原因是因为“淫”。在那个时代，何为“淫”，淫是什么罪的概念应该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淫”当为别解。当时“淫”有聚敛而放纵的意思，甲骨文中的淫是膨胀的意思，也可能是王亥要夺有易氏的权而惹出了杀身之祸。在《周易》的《大壮》六五爻辞和《旅》上九爻辞以及《楚辞·天问》中，也都记述了王亥被有易所杀、上甲微为其复仇的故事。

上甲微复仇时，借助了河伯的力量。河伯为氏族及方国之名，应是由于这个氏族居住在河水左近并且擅长于行船或者治河而得名。然而，河伯之“河”所指并非黄河，而是拒马河或者易水。著名古文字学家丁山引证甲骨文的资料说明上甲微与河伯的史事说，《佚》八六八有“辛巳卜，贞，王亥、上甲即于河”，“即于河”即祭王亥、上甲于微于河，可证上甲微假师河伯之说确自商人传之。

上甲微实现了父亲没有达到的愿望，占据了有易部落，并从这里继续向南发展，一直到商汤建立商朝。而留下的部分继续留在镇江营和塔照，成为土著的古燕国，这个古燕国是商朝的最为重要的联盟国，有着通亲与和亲的紧密关系。后来，周代商时，古燕国的人进行了殊死抵抗，其在商朝朝廷的一百工匠均遭周武王杀害。召公之所以能在古燕国立足，是在商朝的重臣箕子的帮助下，经过将近7年的努力才选择了一块地方建立都城的。

最近，李学勤研究清华简，读出了一篇佚文，是为《周文王遗囑》，他给周武王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舜的故事，一个是上甲微的故事，也就是上甲微继承了父亲遗志，消灭了有易部落，发展壮大了玄鸟部族。这就证明有关上甲微的记载是真实的历史。

目前，在考古学界，基本上是将早商文化，定为“保北文化”(保定北部)，其中时代跨度最大的遗址就是镇江营塔照遗址。所谓的燕文化从文献记载来看是从帝舜开始；从对称的考古学遗存来看，是从塔照一期开始。目前在考古学界，对早商(或曰先商)文化，已经将张家园上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雪山二期文化等多种称呼中主要选用“塔照文化”来代替了，这是从学术上肯定了塔照在燕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



照塔